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论人力资本投资

〔美〕西奥多·W·舒尔茨 著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论人力资本投资

〔美〕西奥多·W·舒尔茨 著
吴珠华等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北京

论人力资本投资

【美】西奥多·W·舒尔茨 著

吴珠华等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1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5000

ISBN7-5638-0213-4/F·112

定价：3.90 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厉以宁	宋承先	张培刚	胡代光
	钱荣堃	高鸿业	黄范章	谭崇台
主编 编委	贾湛	梁小民		
	于同申	厉以平	何宝玉	李玉臣
	吴珠华	吴衡康	杨仲伟	杨德明
	宋慧毅	邹蓝	范恒山	冼国明
	俞品根	施炜	顾昕	舒元
	薛进军			

编者献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介绍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介绍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决定系统地翻译出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主要著作，作为翻译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到1987年为止已颁发19届，共有欧美的25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R.费瑞希和荷兰经济学家J.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者。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

学家P.萨缪尔森、K.阿罗、W.列昂惕夫、P.库普曼、I.克莱因、G.德布鲁，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苏联经济学家L.康托洛维奇都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比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L.克莱因、J.托宾、F.莫迪利亚尼、R.索洛，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70年代后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代表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M.费里德曼、G.斯蒂格勒、J.布坎南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反映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获奖者中还有一批对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R.斯通对国民收入统计作出开创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和T.舒尔茨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有独特贡献；瑞典经济学家B.奥林和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H.西蒙对管理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选编以获奖者的代表作，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中影响重大的名著以及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启发和借鉴的著作为主，每位获奖者的著作至少选一本，以保持其系统性与代表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应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分析

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老一代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谨向关心与帮助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

编 委 会

1988年4月

译者前言

西奥多·W·舒尔茨1902年4月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1930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后应邀赴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从1934年起任该院经济、社会学系主任。1943年后舒尔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曾任该大学经济系主任职务。1960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与威廉·阿瑟·刘易斯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出现了许多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阐述清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应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具有资本的属性，同时又有异质性。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会对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做出合理的反应，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结果就会使社会经济迅速增长，提高国民收入。这样，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便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可以提高人口素质的活动，就变得格外重要。在这种理论基础上，舒尔茨对重视和发展教育、卫生以及经济信息的获取和人口迁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方案，很值得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与借鉴。

尤其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人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所以，认真读读这

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认清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坚定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发展经济的信心。为此我们共选了14篇舒尔茨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论文，编译成集。

本书编排的顺序是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思想出发，尽可能全面地收入他有关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教育、健康、人的时间价值、人口迁移等等具体问题的论文。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工作难免会有不当之处，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入了《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中由杜月升译、高鸿业校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其余各篇分别为吴珠华、陈剑波、张伟、贾湛、施炜等译，吴珠华校。

1989年11月

目 录

1. 人力资本投资…………… (1)
2. 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思考…………… (17)
3. 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的经济价值…………… (28)
4. 穷国的经济学…………… (40)
5. 贫困经济学
——一位经济学家关于对穷人投资的想法…………… (54)
6. 教育资本构成…………… (68)
7. 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
——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89)
8. 高等院校教学的最佳投资：公平与效率…………… (114)
9. 高等教育的成就…………… (146)
10. 人的时间价值经济学…………… (160)
11. 世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才有效配置…………… (184)
12. 印度1918—1919年农业劳动力损失的重要意义
——答森教授…………… (197)
13. 对人口迁移的观点…………… (200)
14. 寿命、健康、储蓄和劳动生产力…………… (211)

人力资本投资

虽然人们获取有用的技术和知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关于这些技术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类型，关于这种资本实际是周密投资的一种产物，关于这类资本的增长在西方社会里要比常规（非人）资本的增长迅速得多，以及关于这种增长很可能是西方经济制度最出色的特征等等，这些事实却并不明显。国民产量的增长比较土地和按人时计算的劳动量以及能再生产的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概就是这个差额的主要说明。

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便是明显的例子。上学的成年人和接受在职培训的工人所放弃的收入是同样明显的例子。然而，以上这些全都不在我们的国家统计之列。利用空闲时间改进技术，增进知识，是普遍的情况，而这些也不在记录之中。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方法，人力的质量能够得到很大的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我认为，工人平均实际工资的显著增长，大部分来自这种向人力资本的投资。

我想先说经济学家们避免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作出明确分析的原因，再谈谈这种投资的能力，以便解释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许多难题。不过，我将集中论述人力资本的范围和内容以及它的形成。最后考虑一些社会和政策含义。

I . 回避人力投资

经济学家们早已知道，人是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拿劳动对于产量的贡献来衡量，现在人类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其余各种形式的生产能力的总和。经济学家所不曾强调过的简单事实是：人类是向其自身进行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很少不敢进行抽象分析，并且时常以行不通为荣，但是，在研究这类投资时，他们的胆量并不大。无论何时，甚至只要接近这个问题，他们就会小心翼翼，如临深渊。毫无疑问，小心谨慎是有道理的。由来已久的伦理学和哲学的争论，是始终存在的。自由人是经济活动所要满足的首要目的，他们决不是财产或者可以买卖的资产。还有同样重要的理由是，把劳动看作是一种完全脱离资本而纯粹天生的能力，这对于边际生产率的分析是太方便了。

只要一提起向人力投资，就会使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感到不快。除非在奴隶社会，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便总不允许把人类看作资本物品和我们所憎恶的东西。社会经过长期斗争，摆脱以契约束缚人的制度而形成保障人们免受奴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对于我们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成就赢得了我们的高度评价，因此，把人类看作是通过投资便可得以增加的财富，是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相违背的。这样做似乎是再一次把人贬为一种纯粹的物质要素，贬为类似财产的某种东西。而且，对于人来说，将自己看作一个资本物品，即便不会妨碍一个人的自由，也似乎是贬低他的人格。甚至于约翰·S·穆勒这样的人，也曾一度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应被视为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才存在的。但是，穆勒确实错了。在人的财富这个概念之中，并没有违背他所谓财富完全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这个思想的含义。通过向自身投资，人民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用

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

在少数把人视为资本的人们当中，有三位杰出的人物。作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大胆地将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的能力，全都算作是资本的一部分。H·冯·屠的所见相同，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并不会贬低人格，或者有损于人的自由和尊严，而恰恰相反，在战争中不应用这个概念却是特别有害的。他说：“……因为在战场上……人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保全一门炮而一次牺牲一百个青壮年。”其理由是“……购置一门炮要花费公共的金钱，而人，只需颁布一个征兵法便可以无偿得到。”欧文·费雪还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然而，处于主导地位的看法却认为，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类，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实用的。马歇尔的崇高威望足以说明为什么这种观点会赢得普遍承认。马歇尔认为，尽管以一种抽象的和数学的观点来看，无可否认，人是资本，但是，在实际分析中把他们当作资本，与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虽然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的此处或彼处也看到人力投资的现实意义，但是向人力投资却很少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的核心内容之中。

不把人力资源明确地看作是资本的一种类型，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这样做有助于人们继续使用古典的劳动概念，这一概念把劳动看作是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这种劳动仅仅需要少量的知识和技能。于是，按照这种说法，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被看作是大致相等的。这种劳动概念，在古典经济学里就不正确，而现在，其错误就更加明显。用算人头的^①方法来计算那些能够而且需要干活的人数，并且把这样一种计算看作是衡量一种经济要素数量的标准，这种作法并不比那种靠计算各式各样机器总数来确定这些机器作为一种资本股份或是一连串生产设施的经济重要性更有意义。

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

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这种知识和技能大半是投资的产物，而这种产物加上其他人力投资便是技术先进国家在生产方面占优势的主要原因。研究经济增长而无视这些人力投资，就等于想不用马克思主义就能解释苏联的意识形态。

Ⅱ. 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

一旦将人力投资考虑进去，就能解决许多与我们的动态的、增长中的经济有关的矛盾和难题。让我们先概略地叙述一些次要而不可忽视的情况。

当农民从事非农业工作时，他们的收入大大少于种族、年龄和性别都与他们相同的工业工人。同样，即使将失业、年龄、城市规模以及地区等方面的差别对于收入的影响都考虑在内，有色人种的城市男子，其收入也比城市里的男性白人少得多。因为，收入上的这些差别完全符合相应的教育差别，所以，不难设想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果。经营农场的黑人，不管是佃农还是场主，其收入总比经营类似农场的白人少得多。幸亏，作物和牲畜都是平等待人的。收入的巨大差别似乎倒是大体上反映为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差别。南部工人的全部所得明显地少于北部或西部，而他们的教育水平，平均说来也比较低。大多数农业季节工人的收入与其他工人相比确实异常低微，其中有许多人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健康状况不良，属于非熟练工人，并且实际工作能力也很低。用人力投资数量的差别来说明收入的差别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要求。比较新的观察表明，年纪较轻的工人具有一种竞争优势，例如，在获取令人满意的职位方面，加入劳动力行列的年轻人，据说比年纪较大的失业工人要优越。这些年轻人大都受过12年教育，而年纪较大的工人所受教育大部分是6年或者少于6年。所以，这些青年工人的那种被人们观察到的优势可能不是因为社会保险或退休

方案的硬性规定,或者雇主的社会偏好所致,而是因为人力投资例如教育导致生产力的实际差别所致。还有一个例子是,表明熟练工人收入与年龄关系的曲线,往往比非熟练工人的曲线要更陡一些。后面就要提到的在职人员训练投资,似乎是一种合适的说明。

经济增长要求工人在国内大量流动,以适应变化的就业机会。青年男女的迁移要比年纪较大的工人更加容易。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迁移所需的费用是人力投资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迁移当然也就具有经济意义了。与年龄较大的工人相比,年轻人能有更多的年限由这类投资获取利益。因此,只要工资额稍有一点差别便足以使得他们的迁移有利可图,换句话说就是,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用于迁移的投资可望得到更多的收益。就是这种差别便可说明有选择的迁移而无需求助于青老年之间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

以上提出的都是人力投资产生长期收益的实例。这对于青年的教育、训练和迁移的投资来说都同样是适用的。并非所有人力投资都是这种情况,有些投资与目前的效果有更直接的关系。例如,有些国家用于食品和住房的开支就是这种投资,因为那里劳动主要是单纯运用人的力气,所需要的是人的活力和耐久力,而且食物的摄取远不足以维持全天的劳动。在“贫瘠的”大平原上和肥沃的亚洲山谷之中,千百万成年男子的饮食是如此缺乏,致使他们每天干不了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说他们是就业不足似乎是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把食物部分地看成是消费品,部分地看成是现时的“生产物资”,就象印度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肯定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忘记,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甚至于在马歇尔和庇古时代,西方经济学家还是时常把工人的食物增加与劳动力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要谈一谈与经济增长之谜密切相关的三个纠缠不清的重要问题。首先考虑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变动。据说一个国家积累的再生产性资本比其土地和劳动更多,则这个国家总会以更大的“深度”利用这类资本,因为这类资本越来越多而且便宜。

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相反，现在的估计表明，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这类资本与收入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难道我们还能断定无论解释贫或富都如资本—收入比率无关吗？或者断定这个比率的提高并非经济增长的前提吗？这些问题引起了重要的争论，这些争论关系到拥有财富的动机和偏好，关系到进行特殊投资并由此而积累资本的动机。为了本文的目的，最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资本—收入比率的这些估计仅仅说的是全部资本的一部分。最遗憾的是这些估计都特别把任何人力资本排除在外。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的。所以，我们便不能根据这些估计断定与收入相比，全部资本存量已经下降。相反，如果我们接受了下面这个并非不可能的假定，即人的动机和偏好，可供他们选择的技术机会以及某些时期随经济增长而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地引导着人们将总的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率大致保持不变，那么，估算出来的资本—收入比率的下降，便不过是一个信号，表明人力资本不仅与通常所说的资本相比，而且与收入相比都是在不断地增长着的。

大量的估计数字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比国民资源的增长要快，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并非不相干的难题。与用于产生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资本的数量三者结合起来的数量相比，美国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速度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几十年间，从一个商业周期到另一个商业周期，两个增长速度之差变得越来越大。将这个差额叫作“资源生产力”的一个量度，那是给我们的无知起了一个名称，而并没有消除掉我们的无知。如果我们接受这些估计值，那么，国民资源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长期稀松而且脆弱。如果这种差额得不到说明，那么，作为通用衡量标准而应用于投入产出的那种公认的生产理论便会成为一个玩具，而不成其为一个有助于研究经济增长的工具。

如果我们完全忽略这个指数，并无视那些使得诸如总产出和总投入这类总量数字的全部估算产生误差的汇总问题的话，那么，

有两种力量可能说明这个差额。一个是规模的收益；另一个是已经出现但在估计投入品时被漏掉的投入品质量方面的巨大改进。毋庸置疑，我们的经济一直在经历着被一个时期的规模收益递减所抵消的另一时期的规模收益递增。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鉴别和衡量出增长的净量，那么，其结果可能会表明这个净量是巨大的。人们未曾给予充分考虑的投入品的那种质量改进，有一部分肯定是代表物质（非人）资本的改进。不过我自己的看法是，与被人忽略的人的能力的改进相比，这里的缺陷以及被人漏掉的规模方面的经济效果都是投入增长速度和产出增长速度两者之差的次要根源。

只再进一步便会把我们由现有估计所提出的两个难题引到作为核心内容的第三个问题上去，也就是基本上尚未得到说明的工人实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的问题。难道这是额外的收入吗？或者是等待调正劳动供给的一种准地租吗？还是反映固定劳动量的纯地租呢？把它说成是代表一种向人类投资的收益，似乎倒合理得多。观察到的按劳动单位平均的生产率的增长，只是因为保持这种劳动单位长时间不变的缘故，尽管这种单位劳动实际上由按工人平均的人力资本数量的稳定增长而已经不断增加。正如我们从我们以往的资料中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人力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部分已经变得非常巨大。

为这个根本问题提供相同答案的另一方面是，大战期间工厂和设备遭到严重摧毁的国家在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工厂被炸平了，铁路枢纽、桥梁、港口被破坏了，城市被毁灭了，比比皆是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建筑物、设备以及库存物资全部都被化为废墟。那些幸免于轰炸的实物设备在战时的损失不是如此明显，然而数量却很大。经济学家应该估价恢复这些战时损失的意义如何。从事后来看，他们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这些损失对日后的阻碍作用。我曾经多少参与过上述工作，并认为有一种特殊理由去回顾以往而且急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战后不久所作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